# 美国腐败的政治与经济因素

**1、引言**

虽然在美国国内，法律和政治实体的地位非常高，但是公司还是会经常受到腐败行为的影响。在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州，公司很可能出现以下几个特征：对于收入的行政监督较少、过度操纵（粉饰）他们的收入、公司股票流动性有所降低，因此也表明了公司股票的价格包含了更多不对称的信息。美国各州文化规范（传统）的不相似之处可能会在造成巨大的异质化。如果公司含有卷入腐败的文化，那么企业公司治理的不同之处就是巨大的；具有更强大治理过程的公司可以克服当地腐败的不利后果，并可以通过更强大的治理流程来表明其先进的公司质量。在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州，如果公司缺乏强大的内部治理能力，再加上它所遇到的更加密切的行业竞争，最后会影响到公司的价值，其公司整体可能更不透明：所以当他们被迫提高信息披露力度时，边际效益更显着。

**2、美国公共腐败的因与果**

公共腐败意味着以权谋私。腐败可能会通过修改政府开支的结构来阻碍经济增长：腐败的公务员可能会选择将更多的资金分配给特定的预算类别，因为这些类别的开支使他们能够通过腐败行为获得更多的利益。腐败提高了自然资源开支和不可分配的预算部分，减少了高等教育费用的分配。因腐败犯罪被定罪的公务员的数量，构成了腐败内在程度表征的不理想的替代品（大概意思应该是说：因腐败被定罪的人数越多，政府的内在腐败程度越大）。政府机构的根本架构影响着内在的腐败程度。 腐败公务员的行为是为了进一步追求寻利工作而设想的。 腐败对美国的公共支出结构有相当的影响。

公开招聘的代理人（应该就是公务员）从腐败行为中获得利益的选择与从合法正当途径获得利益的选择，取决于在坦诚行为的影响和通过非法途径获取收入的维度上。（大概意思就是：公务员选择老实还是腐败，取决于他保持正直给他带来的影响与他通过腐败带来的收入之间的边际对比，哪种方式获利多，他选择哪种）腐败通常会因为选择维持交易的人之间的交易而出现（字面是说：当交易被取消时，当事人为了维持交易，会选择腐败的手段）。由普通居民数量或公务员数量秩序化的定罪的数量，表明了警察与司法系统的决心、效率以及正直，同时还有对日益具有挑战的腐败的政治性卓越。（意思是：定罪数量与居民总数或者公务员总数的占比，表明了警察与司法系统对待腐败的决心以及面对日益严峻的腐败形式的政治性卓越性。）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入的检察机关资源越多，整体上也就会产生越多的腐败定罪。在当地发生更多腐败的情况下，更强大的治理流程对公司尤为有利。公司治理过程可以通过普通的政治实体来克服腐败问题。考虑到美国健全的法律和监管制度，州的公共腐败程度对公司的价值观和战略影响可能微乎其微。地处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州的公司,会表现的更加保密（翻译成低调更好理解），无论是要保护他们的资产免受公职人员的没收，还是希望减少投资者在参与反腐的承诺时的密切考察。如果这些公司是州的腐败的目标，那么不管公司治理的如何有效，最终的结果都是负面的。如果这些公司成立在在腐败现象更为严重的州，那么在所有公司的治理流程更好的治理流程或外部加强的公司都会帮助投资者。即使在一个州内，公司也受到当地的腐败程度的不利影响。

**3、美国公共腐败的定罪**

少数腐败案件将公务员的内疚行为纳入“内衣贿赂行为”（普通的公共贪污案件明显不雅）。 联邦起诉对于腐败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替代品，因为（i）并非所有的腐败案件都在联邦法院进行; 和（ii）联邦检察官在执行官方腐败或特定类型的腐败案件方面的决心可能会有所不同。关于检察起诉的工作，在州立考察的过程中（关于定罪以及监狱审判）有显著的一致性：，减轻了我们对于公诉人可能会利用腐败定罪的数量而非质量的担忧。

# 腐败与文化

跟随着这些研究者，本文填补了对主观因素的调查，来看他们事都是全世界范围内腐败现象的决定因素。Shadabi(2013)发现，腐败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来源于社会和文化的状况。许多其他的研究调查了腐败现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结果或多或少模棱两可。本文旨在填补文献中的缺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进行了一个跨越98个国家的调研。

文献综述

据透明国际（一个组织，检测各国腐败程度）所述：“腐败是滥用委托的权力为私人谋取利益。 根据损失的金额和发生的部门，可以将其分类为大型腐败，小型腐败，政府腐败。”世界银行提供了一个关于腐败的短小定义：腐败是以权谋私。

展示这种经济行为的道德维度最常见因素就是文化。根据霍夫斯泰德（Hofstede，2011），文化被定义为“将一群人与另一群人区分开来的人类思想的集体心理规划”，诸如诚实，对当局的信任，对人的信任，自豪，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以自己的方式做事情的能力，避免不确定性，时间和空间异化以及长期和短期的取向是一个国家文化特征的元素，确定在经济活动中行事的人的行为。

Husted（1999）发现腐败与文化显着相关。一个腐败国家的文化概况是高权力距离，高阳性和高不确定性避免（的国家）。菲斯曼和米格尔（2007）通过一个调研调查了文化与腐败的关系，这个调研对来自149个国家的外交官的纽约停车违规情况进行调查。他们发现，来自高度腐败的国家的外交官比不是腐败国家的外交官更可能违反停车法。他们认为腐败是文化现象的一部分。 Barr和Serra（2010）也发现了同样的结论。 2005年和2007年，他们进行了两次“贿赂实验”，牛津大学的学生参加了这个实验，作为实验的调查主体，这些学生分别来自于世界上腐败最严重和腐败最不严重的国家，分别是33个和22个国家。两项实验均显示，本科生中，文化对腐败有重大影响，但研究生（或毕业生）情况则相反。因此，对腐败的价值观和信仰可能与原籍国密切相关。对于移民，这些价值观和利益可能会随着文化背景变化而改变。根据文献综述，我们测试了以下假设：

假设1、文化因素影响了腐败程度

霍夫斯泰德（Hofstede）进行的实验对于理解不同国家文化的动态变化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模型有6个维度。